

近代史研究

JINDAISHI YANJIU

5

1987

1979年10月创刊

近 代 史 研 究

5

(双月刊)

总第41期 9月出版

-
- 抗日战争与中国历史 刘大年 (1)
时空观念与中国近代思想 李勤德 傅振刚 (29)

* * * *

- 对外经济关系与大生资本集团的兴衰 章开沅 (49)
黄遵宪晚年的思想及其影响 郑海麟 (65)
论孙中山的进化观 马自毅 (80)

- ~~~~~
书评 《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二卷读后感 汪敬虞 (94)
与 与
评述 护国运动史研究述评 谢本书 (101)
~~~~~

- 试论廖仲恺对民生主义的宣传、实践和发展 ..... 张作耀 ( 117 )  
华侨对祖国抗战经济的贡献 ..... 任贵祥 ( 142 )  
简论边币与法币的同时流通 ..... 杨荣绅 杨帆 ( 164 )

- ~~~~~  
问题 讨论 香港海员大罢工是国民党领导的吗?  
..... 禤倩红 卢权 ( 174 )  
也谈国共两党和香港海员大罢工 ..... 莫世祥 ( 184 )

- ~~~~~  
读史札记 关于刚毅从涿州回京日期的更正  
..... 欧阳跃峰 ( 195 )  
辛亥革命史事考三则 ..... 何一民 ( 200 )  
北伐战争中“铁军”称号的考证 ..... 陈立平 ( 206 )  
陈嘉庚斥汪电报提案考证 ..... 周勇 ( 208 )

- ~~~~~ 苏联科学院访问记 ..... 刘存宽 (211)  
史学动态 廖仲恺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  
~~~~~ 综述 ..... 陈华新 丁旭光 (223)  
1986年中国近代史论文资料
书目索引 (中文部分) 近代史所图书资料室 (230)
-

抗日战争与中国历史

刘 大 年

中国近代历史的关键性篇章

一部中国近代史，可以分成许多篇章。而绝大多数篇章的标题，离不开两个大字：战争。从鸦片战争到土地革命战争结束，中国人民在反对外国侵略、反对本国反动统治者的斗争和战争中，走过了将近一百年。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挑起卢沟桥事变，中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从此开始。经过八年艰苦奋战，中国人民终于给自己打开了一个全新局面，开辟出了中国大踏步前进的道路。中华民族由衰败到重新振起，出现一个伟大的转折。在近代历史中，我们完全有理由把抗日战争看做关键性的一章。

第一次完全胜利的反侵略战争

战争打响，日本当权势力中大部分人沉浸于一片乐观之中。他们确信日军只消“对支一击”，便可凯旋班师。陆相杉山元奏报天皇，事变能够一个月左右解决^①。参谋本部制订的《在华北使用武力时对华战争指导纲要》，预定“扫荡”驻扎北平一带的中国第29军的时间为两个月，击败国民党中央军的时间是三个月^②。陆军省的首领和幕僚们，确认中国是一个不能统一的分裂的弱国，日本只要表示一下强硬态度，中国立即就会屈服。内

① 矢部贞治《近卫文臂》，东京1976年版，606页。

② 白井胜美、稻叶正夫《现代史资料》，东京1964年版，卷9，17—18页。

阁里面一些文职大臣也主张乘机把中国军队势力彻底打垮^①，迅速全部征服这个西邻弱国。在中国方面，国民党阵营的“知日派”和其他民族失败主义者，也恰恰持同一样看法。被人称作蒋介石“宰相”的张群说：“和必乱，战必败；败而后和，和而后安”^②。胡适说，中国为一中世纪国家，断然不能抵抗近代国家的日本，必须认清战争后果。他除了与高宗武等所谓“南京青年智囊团”商定“外交路线不能断绝”，又面见蒋介石陈述自己的主张，并力荐高宗武与日本方面保持联系^③，为求降讲和留下后路。日本侵略者、中国失败主义分子，关于中日战争前途的预断，出发点不同，结论一致。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力量，都根本不放在他们眼里。

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为抗日战争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显著呈现两大特点：一是日军分路深入中国广大领土，正面战场上的攻势达到了顶点。二是敌后战场开辟形成，并且迅速壮大起来。在正面战场上，先后经历了山西忻口、淞沪、台儿庄、武汉等几个大的战役。7月27日，日军向华北中国守军发起大规模进攻，北平、天津相继失陷。日军随即分兵三路，沿平绥、平汉、津浦路进犯。8月13日，日本海陆空军进攻上海，淞沪战役开始。日军陆续投入12个师团约30万兵力，打了将近三个月，占领了上海。日军乘势向西推进，12月13日进入南京。国民党15万大军，在一片混乱中溃败。华北战场上，八路军出师告捷。9月25日在平型关一战，歼灭日军坂垣师团1000余人。平型关之役，表明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有勇气和力量战胜一切凶悍敌人，它及时鼓舞了人民的抗战信心。从战争初起到12月底，半

① 武藤章《军务局长武藤章回想录》，东京1981年版，97页。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下册，620页。

②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下册，685页。

③ 胡适《胡适日记》，中华书局本，下册，576—577页。按：中华本胡适《日记》残缺。J·H·博伊尔所著《中日战争期间的通敌内幕》曾引胡适8月6日《日记》，中华本无此。胡适在这段时间里的活动另有所记。又见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下册，698页。

年时间里，敌人在华北已经占领河北、山西、察哈尔、绥远、山东各省，在江南则占领了京、沪、杭地带。1938年3月下旬至4月初，中日双方会战于台儿庄。日军遭受重创，死伤近2万人，中国军队也随即后退。日本企图迅速结束战争，集中12个师团兵力，近38万人，分五路直扑华中重镇武汉，又从南面进攻广州。10月25日武汉沦陷，21日广州也告失守。武汉战役还在进行期间，日本参谋本部次长即向军令部次长表示，即使攻占了武汉、广州，中国也不会屈服，日军被拖到中国内地去，对日本非常不利，“一定要迅速实现和平”^①。日军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在占领武汉后，也认为“这并不等于我军主力方面的战斗已经完成”，而且“攻占武汉伤亡甚重，这也使我心情忧郁”^②。武汉、广州战役结束时，日本摆在中国关内战场上的兵力达24个师团，近100万人。国内空虚，仅剩下了一个近卫师团留守。在这个阶段中，日本占领了中国主要工业城市和富庶地区，封锁了主要海港。从战役上看，它是胜利了。但从战略的全局看，它极大地失败了。日本没有摧毁中国的抵抗力量，更没有动摇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武汉战役结束，全部正面战场的高潮已经过去，敌后战场的重要地位却在整个战争中突出起来了。

敌后战场的开辟，是与国民党军队从正面战场上象潮水一般溃退同时并行的。1937年11月太原失陷，八路军115师一部驻守五台地区，创立起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包括山西、河北、察哈尔、热河、辽宁五省的各一部分。120师一部坚守在晋西北作战，不久与共产党领导的绥远武装力量汇合，建立晋绥根据地。与此同时，八路军总部率领129师开赴太行山前线，转战于晋东南、冀西、冀南、鲁西北、豫北的广大地区，建立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济南和山东其他一些地区沦陷后，共产党就地组织游击队，建立抗日政权。1939年春，八路军115师一部挺进山东，鲁-

① 原田熊雄《西园寺公与政局》，东京1952年版，卷7，103页。

② 《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368—369页。

中、鲁南、渤海、胶东根据地相继建立。1938年1月，新四军成立，指挥共产党领导的江苏、浙江、安徽、河南、湖北、福建、广东各地的武装，建立华中根据地。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热情拥护、支持下，这些根据地的抗日武装日夜壮大。它们英勇战斗，深入到敌军占领的城市附近和交通线上。这迫使日军必须把相当一部分兵力分散在辽阔的敌后战场上。最初他们还企图掩饰敌后战场的严峻形势，很快就承认必须集中大力来对抗日根据地作战了。1938年9月，日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对前来视察的侍从武官说，八路军游击队“十分猖獗，破坏铁路，袭击各地等不祥事件不断发生。恢复治安的地区实际只限于主要交通线两侧数千米之内”^①。1939年12月，日华北方面军情报主任报告：“共产党势力渗透到了华北全境，就连北平周围……也深入到了民众之中”。在山东方面，扩张更为剧烈^②。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笠原幸雄指出，“以后，华北治安战之癌就是中共及其军队”^③。1941年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报告说：“本军除图谋一扫黄河以北的中央军势力以外，主要对共产军根据地进行毁灭战”，“剿共是肃清的主要目标”^④。武汉战役以前，日军主要在正面战场作战，在那以后，日军同时要在甚至主要在敌后战场上作战了。抗日战争这时进入了相持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抗日根据地抗击的日军越来越多，最多时达到日军的64%，伪军的95%。这个阶段时间很长，一直绵延到反攻开始。

武汉失守以后，日本对国民党政府加紧诱降活动。1938年12月，汪精卫等人叛逃，以后并“还都”南京，同样挂着国民党招牌，成立傀儡政权。正面战场上的日军这时也发动了一些规模不

① [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出版社，(上)，80页。

② 同上书，126—127页。

③ 同上书，178页。

④ 《华北方面军多田司令官的报告》，[日]《日中战争》2，《现代史资料》9），1964年版，718—720页。

等的进攻，如南昌、长沙、中条山等战役，都限于占领局部或小块地区。1941年12月，日本要求“解决中国问题”更加迫切，挑起太平洋战争，强化所谓南进态势。1944年日军在正面战场接连发起中原、湘桂等战役，打通了平汉、粤汉、湘桂各路全线交通；在敌后战场上，频繁进行“讨伐作战”，实行“三光政策”。这一切，都没有改变战争总的形势。这时，日本艰难挣扎，四面楚歌，失败已成定局。它在太平洋战争中，最初因偷袭珍珠港，获得“赫赫战果”。第二年美国开始反攻，日军节节败退。最后战火燃烧到了日本本土。1945年8月9日，苏联对日宣战。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合击下，日本不得不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投降。

8月15日，日本向盟国电发投降照会。9月9日，在南京庄严举行了中国战区投降仪式。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以中国人民的完全胜利，日本军国主义的最后失败收场。这是长达一百年的近代历史上，中国人民进行反对外国侵略战争头一次取得完全的胜利。从第一次鸦片战争起，中国每次抵抗外国侵略的战争和交涉，其结果，不是割地赔款，就是被强加给种种新的不平等条约。其中如中法战争，中国在军事上取得了镇南关大捷，导致法国内阁倒台，最后照旧签订不平等条约，葬送中国西南边疆种种利权。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出兵山东，战后中国作为战胜国的一员参加巴黎和会，结果仍被迫接受日本对山东的占领。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第一次洗刷了中国人民上百年所受的奇耻大辱。然而这个胜利付出的代价是无比高昂的。抗战连续八年以上，敌军铁蹄践踏遍多半个中国的大好河山，这真是书契以来所未有。人民生命牺牲多达2000万以上，财产损失至1000亿美元。和平居民所遭受的残暴屠戮污辱，至今来读当时的报纸和有关记录，仍令人毛骨悚然。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伟大的，中国民族所蒙受的灾难是深重的。至于是谁加给了中国如此深重的灾难，我们一向区分日本军国主义者与日本人民。在这场不义之战里，日本人民也深受灾

难，他们是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牺牲品。

抗日战争胜利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不能分开。在中国抗击日本侵略者，主要靠的中国自己。日本发动侵略战争，首先是倾注最大力量来征服中国，妄图一举把中国变为东三省那样的日本殖民地的。1939年12月28日，日外务、陆军、海军三省大臣联合制定的《对外政策的方针纲要》规定：“处理中国事变应根据既定的基本方针。……以建立中国新中央政府的工作为中心”。为了集中力量进攻中国，其中确定，对苏联要做到日苏“平静无事”；对美国要促使它们对日本“处理〔中国〕事变采取赞成态度”^①。日本的重兵也一直部署在中国。据日本战史《关东军》、《大本营陆军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大东亚战争全史》等书公布的材料，“七七事变”前日本常设陆军师团为17个，事变后屡次增加。至1945年，陆军师团共168个。它们历年分布在中国关内战场上的，最多的年份占94%，最少的一年占35%，8年中，平均每年占76.4%。“八一五”以前，中国关内战场上的日军，仍多达105万人^②。日本是用最大的力量来侵略、征服中国的，中国是主要靠人民自己的力量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世界反法西斯在东方取得胜利的基本事实，就是如此。

中华民族的空前觉醒

近代中国历史上多次反对外国侵略的正义战争，都以投降屈服告终，抗日战争开创历史记录，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为什么？

① 〔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1963年版，421—424页。

② 《世界史研究动态》1983年第7期载邹南星《从日本陆军兵力分布看中国战场的地位》说，1945年日本投降时，日本在华陆军为28个师团，34个混成旅团，总兵力105万。前引《大东亚战争全史》等书，一般只计师团，未计独立的旅团。师团数与兵力数很不一致，更准确的数字尚需进一步查考。

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内部形成了新的团结，中华民族空前觉醒了。尤其在人民中间，这种团结觉醒的程度，是以往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哪一次能够比得上的。在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大举入侵下，中国面临亡国危险。资产阶级，甚至封建军阀，都遇到了存亡问题。出路只有一条：全国各阶层、各民族团结起来，抗日救亡。一面是客观的凶险逼迫，一面是人民的主观抗争，中华民族使自己的觉醒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种觉醒表现在一系列的行动上或动向上。

首先，代表中国两大对抗势力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从十年内战流血转为重新合作，并且以此为中心，结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是中国政局的决定性因素。共产党早在被“围剿”中，就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了各种努力。1935年12月，中共中央通过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决议，1936年5月放弃“反蒋”口号，同年12月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凡此种种，都是共产党推动蒋介石转向抗日的重要步骤。战争爆发，加快了国共两党靠拢的进程。1937年7月8日，中共中央发表抗战宣言，呼吁“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进攻”。7月15日中国共产党又向国民党送交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文件，重申了关于停止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武装暴动方针等四项保证。8月22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布改编红军为国民革命军的命令。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延搁已久的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抗日的宣言。第二天，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共产党的应有地位和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一百年来，中国统治者在列强的进攻下，不敢依靠人民去抵抗侵略，一味对外屈膝投降，丧权辱国，愈演愈烈。蒋介石国民党掌握政权的最初十年，是“剿共”与新军阀互相厮杀，进行双重内战的十年。日本侵略者在这个时间里制造了一个“满洲国”，又制造了一个“华北特殊化”，华北眼看就要成为第二

个“满洲国”了。蒋介石国民党现在同全国人民站在一条战线上共同抗日，这是国内政治形势的一大转变。国共合作，促进了国内各阶层、各民族共御外侮的实现。它本身就是中华民族觉醒的鲜明标志。

中华民族的觉醒，当然不是“七七”事变这一天突然之间从地底下冒出来的。抵抗日本侵略，开展救亡运动，至少“九一八”以后就一直在发展。参加救亡运动的有大批知识青年，也有其他群众。他们各自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共产党抗日救国号召的影响。战争爆发，民气空前旺盛。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立即卷进了抗日的洪流。他们的情况不同，选择道路不同，奋发敌忾，精神是一样的。

农民群众在沦陷区的广大农村里，到处自己组织起来与敌人进行斗争，河北、山东等地，各种名目的农民自卫武装风起云涌。它们竖起“抗日自卫”、“剿匪、抗日、保家、卫国”大旗，号召群众。农民争先恐后参加。例如鲁西北范筑先鲁西抗日军短时间猛增至二、三十万人。冀中马本斋回民支队、冀南赵辉楼民众自卫抗日军都迅速壮大，发展成了抗日劲旅。延安成了先进青年向往的圣地。万千知识青年从四面八方奔向那里。他们之中，有远从侨居的东南亚克服重重困难，经过千山万水而来的。这些青年经过短期学习后，很快走上抗日工作岗位。北平、天津、南京、上海、浙江、广州、武汉等一些高等院校，迅速往后方迁移，分设于云南、四川、贵州、陕西等地。许多学生、教授分别长途徒步前往。据说当年拿破仑大军入侵德国，歌德和哲学家费希特在敌军的围城中照旧安心读书写作。后来德军攻入法国，占领巴黎，自然科学家巴斯德（Louis Pasteur）也拒绝离开他的显微镜与实验室，专心于细菌研究。中国以前有人利用这些“美妙”故事，来宣传“读书救国论”、“科学救国论”，阻止青年参加爱国救亡运动。抗战开始，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的实际行动，说明他们的爱国心不是什么巧妙宣传可以抵消得了的。也就在同一个时候，一部分实业家、工厂主，抱着“为宗国效力”，“誓不

以“厂资敌”的热忱，在敌机狂轰滥炸，运输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拆卸工厂设备，往内地迁移。1939年以前，从华北、华东、华南迁至西南、西北地区的估计约1400—1500万人。这种迁徙有促进西南、西北地区工农业生产、密切各族人民间的联系等多方面的意义。它的主要意义，和大多数人在敌后坚持抵抗斗争一样，是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当亡国奴，克服困难，坚持民族解放战争的顽强不屈的战斗意志。

日本发动这场侵略战争，抱着一口吞下中国的野心。日本的工业水平、军事装备都远居中国之上。日本侵略军又带有封建军事帝国主义的很大野蛮性。这一切，决定了战争必定是残酷的。中国人民在残酷战争的现实面前，显示出了伟大的民族牺牲精神和英雄气概。

无论从整个民族看，还是从人民中的多数个人看，情况都是这样。在战场上，战士们奋不顾身前仆后继。他们象《义勇军进行曲》所激昂高歌的那样，“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去抵挡敌军炮火，挺身拼杀。实际的长城在炸弹大炮轰击下很容易摧毁。中国人民用几百万到2000万人的血肉筑起了一条始终摧不垮的长城，他们的肝胆血肉不止涂炭在中国土地上，也涂炭在缅甸的土地上。这是何等的英雄气概，何等的牺牲精神！敌后战场上的人民战争，尤其表现了这种气概，这种精神。在战场外面，古人以为难得的“毁家纾难”这时成了很平常的事。郭沫若记载

“七七”一周年武汉支援抗战的一次“献金狂潮”说，五天之中，武汉三镇参加献金的在100万人以上，献金总额多达法币100多万元。献金的从富人到乞丐，什么人都有。许许多多穷苦的人不止献一次两次，时时都在献，天天都在献。那100多万元的数目，很大部分是靠着这些贫苦的爱国者一角两角、一分两分地凑积起来的①。了解当时的社会生活，我们就不会用现在的眼光去小看

① 郭沫若《洪波曲》，人民文学出版社，92—94页。

那一两角、一两分钱。须知那是衣食无着的贫苦的中国人，除了血肉之驱以外所能够作出的最大牺牲。一个优秀民族，必定是又智慧、又勇敢的民族。当它需要付出牺牲以求得生存和光荣的时候，人们就敢于去实践。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把觉醒变为自我牺牲，无数事实，令人可歌可泣。它们强烈地表现出中华民族不愧为优秀的民族，表现出了中国人民崇高的爱国主义。

上一个世纪八十年代，外交家曾纪泽在伦敦《亚洲评论》季刊（The Asiatic Quarterly Review）上发表一篇文章，题目叫《睡与醒》（China: The Sleep and the Awakening），说中国人暂时沉睡，往后的会醒过来。也就是所谓“先睡后醒论”。但是那以后相当久中国人还是没有真正觉醒。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认真的教师。中华民族这个观念由于帝国主义侵略不已，越来越深入人心。中国疆域辽阔，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人民的觉醒自然不会那么整齐划一。事实告诉我们，抗日潮流兴起，中华民族这个观念确实成为最大的凝聚力量了，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从睡梦中醒过来了。

社会历史运动规律和自然规律不同。它有长期起作用的，有只在短期起作用的。环境条件改变了，短期起作用的规律也就跟着改变。何况如何判断事件，往往只表现为人们的主观愿望，与规律性联系不到一起。甲午战争中，李鸿章为了推卸失败罪责，说他是所谓“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根本缺少反侵略意愿的清政府，本来只想侥幸取胜，不行就妥协投降。抗日战争中，中国发生了一个巨大进步，中国共产党成了人民力量的坚强组织者和鼓舞者。日本侵略者的对手，再也不是甲午战争的清政权，不是“廿一条”时的袁世凯统治，不是“九一八”中的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了。日本侵略者现在的对手，是一个由共产党发挥伟大作用，以国共合作为中心觉醒了的中华民族，是全中国的人民。这就是为什么抗日战争彻底破除了日本军阀和中国亡国论者们的“中国必败定律”。

国内各派政治势力大变化

自然界现象中，地壳每逢大震动，总要引起一些生物产生异常状态。抗日战争引起的全中国社会的反应不下于一次大地震。对外它是一场规模罕有的军事大较量，对内它是一场强烈震撼社会各阶级，使他们改变原来态度，发生深刻变化的巨大政治运动，政治大变革。整个战争期间，国民党、共产党、中间势力以及它们相互之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之中。

现在，先来看蒋介石国民党所发生的变化。

蒋介石国民党政权从宣布抗日的时候起，取得了全国的承认、拥护。它这时有两面作用，或双重性格。一面作用、一重性格，在国内来说是爱国的和带着革命性的，在国际上说是站在反法西斯阵线一边的；又一面作用、又一重性格，是坚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是反民主、反人民和带着反革命性的。前一面符合抗日需要和民族利益，后一面不利于抗日战争，违反民族利益。抗战初期，前一面表现得比较明显。武汉失守以前，它抗战是积极的。尽管那是不肯动员人民参加的片面抗战，也比不抵抗主义进步，是在为保卫祖国而战。政治上，它这时主要是拒绝改变国民党一党专政，但提供了若干改革的诺言。共产党和其他政治派别对那些诺言履行的可能性也予以相当希望。蒋介石国民党这时在政治和实力地位上都是向上的，得到发展的。可以认为，由于这些情况，在蒋介石国民党全部二十二年统治中，那时它达到了值得称赞的最高度。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对重庆加紧诱降，共产党在敌后战场上很快发展，国民党的态度迅速逆转。前面的作用、前一重性格衰减下去，后面的作用、后一重性格加强起来，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可是几次反共高潮，并没有把抗日革命势力压下去；相反，在共产党和人民的有力反击下，蒋介石又不得不被迫有所收敛、退缩。“皖南事变”以后，蒋介石

发表一篇“军令”、“政令”必须统一的反共演说了事。1943年大军“闪击”陕甘宁边区不成以后，又发表一篇演说，声称共产党问题纯属政治问题，要“政治解决”。反共讨不到便宜，反而落得丧失人心。反一次，它的政治地位下降一次，继续反，继续下降。太平洋战争爆发，蒋介石政权一直希望的取得外援，增强实力，夺取胜利果实，似乎可以稳拿了。实际上，这时它象贮藏很糟的苹果，从内部发生的腐烂正在日益恶化。政治上独裁，特务横行，军事继续溃败，人民生活痛苦，蒋家亲党乘势发国难财。据经济学家马寅初估计，单是孔祥熙在抗战中期拥有的资产就多达上10亿美元，地产分布于南美巴西等地。美国人写的书上说，1944年，宋子文仅在美国的财产就超过4700万美元。控制党、政、军、财大权的陈立夫兄弟、何应钦、孔祥熙等在国民党内外成了人们反对的众矢之的。蒋介石本人也受到众口交责。国民党统治区人心浮动，怨声载道。1943年，美英等国宣布废除与中国订立的不平等条约。在对方完全是惠而不费之举，在国内这是中国人民坚持抗战赢得的一次胜利。蒋介石特地发表《中国之命运》，其中大量篇幅讲不平等条约的危害，宣传“平等互惠新约”的重要性，和断言现在、未来的中国之命运，只能依靠戴上“三民主义”帽子的他本人和国民党来掌握、支配。它的意义，一是把自己打扮成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民族领袖”，压制人民的反对；一是强调重申中国必须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走旧中国的老路。就在此时，蒋介石国民党统治腐朽衰败的严重性，也被因利害关系密切的美国所注意到，由一批外交官、新闻记者的报告和新闻报导揭露出来，纷纷加以指责。他们肯定：“重庆目前仍有政治腐败与保守主义等现象，蒋氏大权独揽，其地位与昔日之帝王相同。彼所领导之国民党，现为主张由国家统治个人思想之陈氏兄弟所把持，此种主张如称之为法西斯主义，未必完全不符”^①。后

^① 美《星期晚报》，1944年8月26日豪塞尔（Ernest Eahser）评论。

来蒋介石与美国为了是否继续任用史迪威问题，经过激烈争论，美总统罗斯福撤回史迪威，任赫尔利为驻华大使，蒋介石利用美国援助，装备起了一支拥有新式武器的庞大军队。但政治上国民党政权的前途更加暗淡了。国民党内部重新有人准备武力倒蒋，驱赶蒋介石下台。

蒋介石国民党的变化——在全国和世界面前充分暴露出它的双重性格中，后一面远远超过前一面。政治地位从高峰下落，一部分人还迷信蒋介石，而整个国民党政权在大多数人心目中声名狼藉，信誉扫地。

现在，再来看共产党这时发生的变化。

共产党是在它16周岁的时候进入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在这以前，它经历了大革命和土地革命两个不同历史阶段的斗争和锻炼。抗日战争开始，共产党有约4万党员，3万多人的军队。到1940年，即抗战经过三年以后，党员增加到了80万，军队增加到了近50万。1941至1942年间，由于日军进攻重点转向敌后战场，抗日根据地缩小，八路军人数减少。但在那以后，共产党领导的地区和武装力量又重新扩大、发展，扶摇直上。这种发展的每一个前进，都要经过艰苦的武装斗争，打退日军的占领，摧毁敌伪政权才能实现。一面要抵抗日本侵略，一面又要反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分裂投降活动。同前面经历的两个革命战争时期相比，共产党这时更加成熟了。实际上，应该说共产党是在总结前两个阶段的经验的基础上，在抗日战争丰富的实践、洗礼中完全成熟起来的。这显著地表现在：（一）从抗日战争的当前实际出发，反教条主义，反关门主义。教条主义只知道背诵本本，用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关门主义不要群众，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它们都对革命产生过极大的危害。反对教条主义，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应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一切从实际出发，使各项方针政策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反对关门主义是要走出狭隘圈子，使自己成为全国性、群众性的大

党，与一切抗日爱国力量结成广泛统一战线，去战胜敌人。教条主义尤其害死人，看上去它似乎只涉及思想理论领域，实际上关系到抗日战争现实斗争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敢不敢大胆地去反对克服它，是中国革命能否前进的一个关口。1942年至1945年一直蹲在延安的共产国际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彼·巴·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记》里，记下了他对整风运动、反教条主义等问题的一系列看法，向莫斯科报告。他认为反教条主义，就是要“否定王明”，反对中国的国际派。“毛泽东从事党的活动的特点，就是修正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正象高尔基描写的某个叫费道尔·邓恩的孟塞维克一样。中国共产党反苏反布尔塞维克^①。这些丝毫不了解中国情况的完全错误的观点，显然不止反映了弗拉基米洛夫个人的观点。整风运动着重总结了反对主观主义即反对教条主义的经验，又推动了它的深入。（二）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抗日战争中，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如何对待它，关键是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是否要把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开始不久就强调指出，与国民党和其他党派的统一战线，是在一定原则纲领基础上的合作，不是无原则的行动。否则“统一”会成为阶级投降主义，最后成为民族投降主义。不顾国内国际的压力、干扰，共产党制定和坚持了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方针。驻共产国际的代表陈绍禹在抗战爆发后三个月回到延安。他提出一个口号：“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所谓“一切经过”，也就是要一切经过蒋介石、国民党。如果这样办了，共产党的独立存在也就完了。有的研究著作上说，陈绍禹的主张出于斯大林的指示。虽然书上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但合乎事实。斯大林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前期，都主张中国共产党应当接受蒋介石的指挥，不应该讲独立自主。他那时只看重蒋介石的力量，并不看重共产党的力量。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也有错误的了解。至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

① 《延安日记》，203页，276—278页，354—355页，507页。